

文化、族群

与社会的反思

乔健 李沛良 李友梅 马戎 主编

社会学人类学论丛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社会学

文化、族群与社会的反思

乔 健 李沛良 李友梅 马 戎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族群与社会的反思/乔健等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11
(社会学人类学论丛)

ISBN 7 - 301 - 09804 - 9

I. 文… II. 乔… III. 文化 - 中国 - 学术会议 - 文集 IV. G1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9555 号

书 名: 文化、族群与社会的反思

著作责任者: 乔 健 李沛良 李友梅 马 戎 主编

责任编辑: 胡利国

标准书号: ISBN 7 - 301 - 09804 - 9/C · 0379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5016

电子信箱: ss@pup.pku.edu.cn

排 版 者: 北京高新特打字服务社 82350640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3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34.5 印张 600 千字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1.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谨以此书献给费孝通先生

《社会学人类学论丛》编辑委员会

学术指导：费孝通

主 任：马 戎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长江 马 戎 王铭铭 刘世定

刘 能 李建新 朱晓阳 邱泽奇

赵旭东 赵 斌 高丙中 郭志刚

钱民辉 麻国庆 蔡 华 潘乃谷

《社会学人类学论丛》出版说明

北京大学的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中国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是在费孝通教授主持下于1985年和1987年相继建立的,多年来始终在他直接的学术指导下进行教学、科研以及培养新一代社会学者的工作。费孝通教授一贯倡导认识中国社会必须深入到社会实践中去,从科学的调查研究入手。他自己身体力行,无论在选定命题、提出破题思路、理论指导、研究方法和学风等方面都在实践中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学术发展之路。

遵循社会学学科重建的方针,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按照实事求是的精神,密切联系和结合当前中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实际重大问题,积极以学术研究成果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在过去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中,我们努力迈出了第一步。现在全国人民都为在21世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我国的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的腾飞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上涌现出了大量的新现象需要我们去研究,出现了大量的新问题需要我们去分析,同时因学科一度中断,有许多社会学研究的基础工作也需要我们不断进行补充与积累,继往开来,今后我国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研究园地将越来越宽广,社会学人类学者的责任也将越来越沉重。任重而道远,只有奋发努力,再接再厉,才能使我们的学科建设适应中国改革发展新形势的要求,并为推动中国社会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为了学习和发扬以费孝通教授为代表的老一代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的学术思想和踏踏实实的学风,也为了交流年轻一代学者的学术成果,我们汇集了自我所承担“八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以来的部分成果,编辑成《社会学人类学论丛》出版,自1996年至2004年共出版40余卷。今后这一个系列的丛书,将主要包括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密切相关的调查报告、区域发展研究、专题研究成果等等。这些成果不但具有学术价值,而且对于从事具体工作部门的人员,也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与此同时,我们还编辑出版了《社会与发展研究丛书》和《社会学人类学译

丛》两套系列丛书,主要结合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学科建设,从相关的学术理论、研究方法、重要专题研究等方面介绍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经典理论和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此外,我们社会学界的一些同仁与华夏出版社共同组织出版了《高校经典教材译丛——社会学》。我们希望,以上这几套丛书的出版,将会进一步推动我国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学科建设,促进社会学与人类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并逐步创立扎根于中国土壤、具有中国文化与社会特色同时又能够真正走向世界的社会学、人类学学科。

《社会学人类学论丛》编辑委员会

2005 年 3 月

致 谢

第八届“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于2003年11月16日至19日在上海市上海大学乐乎楼举行,虽由上海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北京大学、台湾东华大学联合主办,但由上海大学承担主要任务,钱伟长校长自始即全力支持而且亲临致开幕词,李友梅副校长则偕同其助理顾跃英女士全身投入筹备工作;此外,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潘乃谷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的陈美贞女士,以及东华大学原住民族学院的郑雅雯小姐,则分别负责大陆、香港、台湾三地参与学者的联系工作,谨先于此对他们的辛劳一一致谢。

本论文集的繁体字版于2005年春季由台湾丽文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由东华大学族群关系与文化研究所的朱苓尹硕士担任助理编辑,而丽文公司的杨丽源董事长已连续四届无偿为研讨会出版论文集,其对学术的热忱与无私贡献,令人钦佩,谨于此一并致谢。

本文集的简体字版由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负责具体编辑事宜,并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北京大学出版社曾出版了“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第五届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的应用与中国现代化》,现在又承担第八届研讨会论文集的出版,谨代表编委和与会同仁特此致谢。



△1983 年第一届合影于香港中文大学



△1985 年第二届合影于香港中文大学



△1993 年第四届会议情形(摄于苏州)



△1997 年第五届合影于东华大学



△1999 年第六届合影于江苏省吴江市



△2001 年第七届开幕典礼于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



△2003 年第八届开幕典礼于上海大学

代 序

编者按:过去二十年中所召开的八届“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都是由费孝通先生作主题演讲。费老曾谦称这八届研讨会给了他很大的鼓舞与启发,事实上是二十年来各届研讨会正是在费老不断的鼓舞与启发下推进。本届研讨会原定在2003年4月举行,费老还提早到了上海,后来却因“非典”(SARS)爆发延到11月,而费老因临时身体不适不能再来,于是给大家写了一封信并委托潘乃谷教授代为宣读其论文。费老在这封信中扼要叙述了这一系列研讨会过去与未来的特殊意义。稍早于这封信,费老也给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同仁写了一封信《老来还是要再向前看》,指出今后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学科建设该走的道路。我们决定把这两封信依原来形式作为《代序》刊在本论文集之首,作为本届研讨会以及中国社会学、人类学今后发展的重要指引。

给第八届“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的信

1981年4月我到澳洲讲学,路经香港。在香港中文大学见到当时任人类学系主任的乔健教授,他向我介绍,自七十年代末香港和台湾的社会科学学者和同行间已有密切往来,并围绕“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国化”等题目召开各种学术会议,我觉得这种办法很好。那时两岸三地在政治上还没有正式的往来,如何能开辟一条学术界的沟通渠道,是知识分子的共同愿望。为此我们商量邀请一批大陆的学者一同来举办学术研讨会,沟通两岸三地中国学者间的交流,在香港、台湾的朋友李亦园、金耀基、杨国枢、乔健、李沛良教授的支持下,提出了召开“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的计划。

我认为这是许多学者共同的愿望,也是应该做的一件事,就当时情况看是一个开创性的做法,即两岸三地的学者在一起,用中国话来讨论中国人自己的事情,文化上的交流是政治上统一的一个步骤。当我回大陆后,去请很多老朋友来参加这个研讨会时,也得到了他们的同意和热情支持。大家超越了各种政治界限在1983年3月在香港举办了第一届研讨会,打开了局面,到现在已有二十年。每届开会我们都在自愿的基础上,请有代表性的学者来参加会议,大家都很踊跃。早期参加或答应参加但因年老体衰未能出席的学者梁漱溟、钱穆、吴文藻、陈岱孙、芮逸夫、杨庆堃、梁钊韬先生已作古,参加过第二届研讨会的雷洁琼先生现已98岁。二十年后的今天,政治上有了很大变化,香港回归了,大陆更加开放,台湾统一的希望越来越近,文化和学术交流的机会更加频繁了。我们这个会开始时只能在香港举办,以后在台湾、大陆轮流都召开过,这次会已是第八届了,各方面条件都有改变,所以去年筹委会商定这次会可以作一个小结,这是很有意义的。今后这个会采取什么方式请大家商量,但不论采取什么方式,这个研讨会目的是要把这些交流活动继续下去。

上一届即第七届研讨会是在香港开幕并在台湾继续进行的。我在开幕式上讲过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参加会了。后来我很高兴地得知第八届研讨会准备于今年(2003年)4月在上海召开,而且确定了主题:文化的差异与共存。我因此早早地做了准备,并提前到了上海,后因“非典”而搁浅在了上海,我们的会期因此延期到现在,我是准备好要来参加的,但开会前身体不太舒服,年老体衰不能来参加了。所以我请潘乃谷把我准备好的论文《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提交给大家,请大家批评指正。

近年来,我很关心世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大问题,现在正处在中国进入世

界,世界走向一体化的时期,在这个世界形成共同体的过程中,我们中华文化将起到什么作用?能作出什么贡献呢?这是我们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共同关心的大问题。我认为中华文化可以提供一个道义的基础,从文化自觉到中西文化的交汇,以经济为先导,形成一个有道义的基础的世界共同体。我感到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有很多工作可做,大有用武之地。在这种情况下,香港、台湾、大陆的学者更需要加强交流。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个美好的全球共同体一定会出现,而且中国文化在这个新结构中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为了迎接这个新局面,中国各地的有关学者都要加强交流和合作,希望年轻一代发挥更大的作用,多努一把力,今后的具体做法,请大家出主意。

在此预祝研讨会成功。

费孝通

2003年11月10日

老来还是要再向前看

我10月1日才从广东回京,感到这次收获很大,本打算9日再去杭州开个会,但5日开始身体不适,没有去成。病中不能看书和写字,讲话也不方便,但脑筋没有受影响,想了不少问题。这几天好点儿了,边说边写,让潘乃谷记录下来,有机会希望向校领导汇报一下,也和研究中心的同仁们交换一下意见。

首先,说说我最近一直关心和思考哪几方面的问题:

- (1) 世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大问题;
- (2) 中国的经济区域发展的形势;
- (3) 中国文化的复兴和中西文化的交融;
- (4) 社会学的发展;
- (5) 人类学的发展;
- (6) 整理我一生的学术思路。

其次,我近来把自己的思路理出了一个框架,把自己多年来研究的一条基本思考路线打通了,从“江村经济”——“行行重行行”——“文化自觉”——“区域经济”直到“天下大同”,就方向、方法、目标和步骤都比较清楚了。这不是随意想出来或写出来的,是随着我所生活的这个时代里近一百年的变化发展,从实求知所得。人的思想很难超出这个时代的实践,我们要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历史的历程中总结出一个框架,研究出一个发展的格局。它是一个历史的说明,说得对不对,还得看事实的发展。今后还会有曲折,可能情况更复杂,不是我所能看到的。所以说,我的思想和看法要靠研究去落实,要扎扎实实一个个地方或一个个问题去做,我希望它们能实现,如果能成功的话,我是很高兴的。我想我应该做得更好一点,但是没有做到,主要还是自己不够努力、不够认真,得之于社会的多,还给社会的少了。

回过头来谈谈去广东的收获。CEAP即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的经贸关系安排非常重要,它把我的思想总合起来后,再向前看出去,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很高兴在自己学术生命告一段落时,能看到一个比较清楚的轮廓。

今年是我的《小城镇大问题》发表二十周年,我先后写了两篇文章,一是《家乡小城镇大发展的二十年》,二是《发展如蜕变,谈城镇和区域经济》,后一文中谈到“珠江模式”的蜕变,它从借船出口到造船出口是迈出了一个很大的步骤,尤其是深圳的发展,为珠江三角洲其他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榜样。但问题是香港如何巩固自己的地位,这是一个大问题。说得远一点,是“一国两制”的

前途问题。

从长远看,香港必须同大陆之间加强联系、加强融合。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告诉我,他们紧紧抓住 CEAP 的机遇,正全面推进包括粤、港、澳在内的“大珠三角”的区域合作,目前正着手研究和推动“泛珠三角”经济区的形成和发展,拓展广东发展的战略腹地。下一步,他们将着手推动“9+2”计划,即在目前“泛珠三角”九省区的基础上,把香港和澳门纳入进来,拓展更大的发展空间。这九省包括广东、福建、江西、广西、海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可以说是南中国经济区域问题了。

这个格局看来用的是“前店后厂”的原则,利用香港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结合内地的腹地,这是一个总的思路,也是 CEAP 协定大方针的根据和落实。“9+2”计划并不容易,一方面需要和香港接得上,另一方面香港要成为真正的龙头,继续发挥它在世界和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为一个经济统一体,可能不是问题。那么从政治方面来看,我想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大国策,是“一国两制”的续篇,这里不但包括台湾问题,也与深化内地的政治体制改革有关,是一篇大文章。广东省已感到担子很重,改革开放初期,广东靠香港带动,现在“9+2”的格局中,广东须一头推动香港,另一头拉动内地八省,其中既有竞争,也有互补。其结果如何,虽可分析和试加推断,但最终还是要跟上发展去看,再有十年、二十年,甚至五十年,我虽然看不了这么远了,但能看到方向和目标也很幸运,自然希望年轻一代跟上这个发展去观察、去研究,即从实践中去看全球化中的经济局面和“一国两制”的导向。

另外,炎黄文化研究会为了准备明年在澳门召开的年会,今年8月我们到山西开了一个会,提出了中西文化的“会”和“汇”问题。由此,把自己近些年来关于这方面的看法整理了一下。若就中国文化发展过程看,从秦汉—宋明—民国和人民共和国,在清代中西文化中有一个“会”的阶段,而现在则进入了全球化的时代,已经不只是“会”的问题,有碰撞,也有汇合,总要走向交融时期。问题是在这个世界形成共同体的过程中,我们中华文化起到什么作用,能作出什么贡献呢?我认为中华文化可以提供一个道义的基础,从文化自觉到文化交汇,以经济为先导,形成一个有道义基础的世界共同体。我感到社会学和人类学有很多工作可做,大有用武之地,至少过去我们在社会秩序、文化自觉方面的研究都很不够。

由此,我也常常想到社会学学科和人类学学科随着时代的发展,进一步应如何做的问题。关于对社会学的想法,去年下半年整理了《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一文,发表在今年《北京大学学报》第三期上,《新华文摘》第九期也